

# 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部巨著

## ——评《道教文化新典》

吴 洲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类型都是特定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晶,道教文化也是如此。所以,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内在蕴含,不能离开固有文化的考察和探索。众所周知,中国以其悠久文明而见称于世。这种文明具有多元的复杂内容。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如何从时代意义上解读道教文化内涵,加以理性审视,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项不可忽略的工作。自1978年以来,由于政府对学术工作的重视,我国人文科学研究取得一系列成就。道教研究在这种背景下也日益兴旺起来。鉴于道教文化本身内容的丰富性以及它与传统文化其他方面的错综复杂关联,学术界正致力于该研究对象的多角度观照与开拓。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道教文化新典》(以下简称《新典》)可以说就是一种新开拓之成果。这部著作由我国著名道教研究专家卿希泰教授和詹石窗教授担任主编,会集了全国一批学界精英历时5年完成。全书共79.1万字。这是我国首部以类型学方式对道教文化体系进行新的架构的高水平学术巨著。

### 一、以类为纲,展示道教文化广阔体系

《新典》的首要特色在于引入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道教思想文化进行系统观照,勾勒出一个别开生面的体系。

正如其它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一样,道教研究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我国老一辈学者即着重田野考察和文献搜集。如陈垣、王明、许地山、傅勤家、蒙文通、陈国符、黄公伟、汤用彤、陈寅恪等人,都在这方面下了许多功夫,为后人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资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道教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新典》在总结我国该领域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于类型划分,依传统十二地支顺序对其文化体系展开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论述而成十二编。这十二编分别为:神仙、道派、金丹、医药、气功、符咒、占卜、辨兆、堪舆、禁忌、科仪、艺术。每编又各分三章,构成相当完整的内容。

就像生物有千恣百态的种属一样,世界总格局中的文化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具备一定历史的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这就造成了相互区别的文化形态,从而使得世界文化显得丰富多彩。如何对世界文化进行描述?角度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将很不一致。假如从区域角度进行考察,就可以建构区域文化类型学;假如从功能角度进行考察,就可以建构文化功能类型学;假如从学派角度进行考察,就可以建构学派文化类型学。《新典》就是基于学派范围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类型学体系。所谓“学派范围”是指学派自身活动局限及所生成的文化领域。就道教来说,就是道门中人遵照其基本宗旨所展

开的活动及创造的文化时空。假如从纵的方面考虑,可以展开道教文化的历时描述;假如从横的方面考虑,则可以形成道教文化的块面性体式。当然,“横”与“纵”只是因为阐述需要所进行的一种划分。在客观上,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道教文化存在就具有“立体多面”特质。如何将这种多面特质揭示出来,寻求一个进入门径是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典》可谓用心良苦。该书所列十二门类既展示了道教文化的主要构成,又体现了路径之方向。在十二类型中,以“神仙”为龙头,而以艺术殿后,这绝不是机械或简单的排列,而是经过一番认真思索的,它的布局既显示了学术论著写作技巧上的块面均衡美,又反映了道教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因为道教的根本目标是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神仙”是道教之所以为道教的缘起动力,又是其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故而,《新典》将之放在起始之部来考索,这是符合道教本身历史状况的。出于神仙景仰心理与追求目标,道门中人形成了派别组织。所以,该书将“道派”置于“神仙”篇之后,这是完全符合道教本身的思想状况的。有了道派,就有了金丹、医药、科仪等等一系列活动,形成相应文化门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派之后的金丹、医药、气功、符咒等等门类都是由道派衍生出来的,而百舸争流式的文化存在又都凝聚成为艺术。这种艺术既是道教活动的思想结晶,又是文化的精神升华。在这种升华里,书法绘画、戏剧舞蹈、音韵经颂以美的旋律传达出先民们的生存需求与理想心声。尽管在外在形态上,它仍然给人以某种神秘意味,但其丰富的想象却拓展了思维的空间,跳动着民俗的生命脉搏。《新典》对其中所凝聚的精神内涵进行分解与概括,以凝练的语言传达了丰富的内容。

## 二、以实为要,审视道教文化绵延脉络

正如其他历史文化往往糟粕与精华并存一样,道教文化也是个庞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神学信仰的心灵表现,又有与传统科技相交错的内容;既有民俗礼仪的资料,又有文人雅士的生命讴歌,等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道门中人以其特有专注力使其文化绵延不绝,在因袭中发展,在发展中变化。怎样对这个复杂文化整体进行勾勒?这是需要一番斟酌的。《新典》在《导论》中阐述了学术原则与方法。这就是尊重事实与大胆探索。所谓尊重事实就是贯彻唯物史观的历史精神。所谓大胆探索就是敢于面对客观存在以审视者的目光进行观照和理性思考。作者指出:“首先,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客观的事实是任何一种理论的最好的审判者。事实胜于权威。任何科学家都必须接受客观事实,哪怕这种事实与自己的想法相违背。其次,科学研究还必须具有怀疑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有超越和突破,固守某种一成不变的旧教条,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这里的怀疑精神并非是无端的猜忌,而是大胆探讨与考索。作者认为,尊重事实与大胆探索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基于这样的原则,作者阐述了贯彻这一原则的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坚持文献性与逻辑性的统一;二是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三是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四是坚持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有机结合。

《新典》把尊重事实与大胆探索相结合的精神贯彻到具体研究工作中,这首先体现在敢于面对道教文化的整体存在而不回避。尊重事实,首先是尊重历史。那么,道教文化的历史存在是怎样的呢?作为复杂多面体,道教文化并非仅是延年益寿的手段,也不是单纯的神学理念的聚合;既不是用“鬼画符”这样的简单评判所能概括,又不是以祈祷诵经可以完全涵容。因此,尽可能把其整体内容以明快的方式表述出来,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这方面,《新典》的确具有敢于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勇气。例如,在历史上,道教确曾有过占卜、符咒、辨兆与堪舆活动,并且留下了许多该领域的文献。此类活动与文献不可避免地存在封建性糟粕内容。过去,有关文化史一类研究著作对此几乎无所问津;即便是专门的道教研究著作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加以考察。《新典》冲破了禁区,对这些在道教文化体系占有重要比重的内容进行了历史概括与理性分析。作者对这些曾经被视为禁区的领域进行开拓,并非是要教人如何去占卜或者画符念咒,更不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提倡,而是将之当作一种历史对象来梳理与审视,分析其存在的特点和流行的原因,将此类现象回归到人类生存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加以解读,通过民俗学与社会学的阐释,以显示内在心理之律动。这样的结果可以防止以偏概全,从而对道教文化的全体有一个历史的相对完整把握。

## 三、以新为境,探索道教文化多层理趣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须着重创新。只有创新才具备个性和生命力,从而才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新典》作者充分意识到创新的意义。这部著作在名称上使用“新”的字眼,并非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作者进行研讨、分析所遵循的一种理念。从其结构编排上,我们已经可以确实感受到其新颖气息。如果仔细

品味其内容,我们更加可以体会到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开拓精神与新特色。

首先,《新典》的新特色表现在作者能够抓住核心论题从人们尚未注意或者相对忽略的方面展开多层次分析。例如对“神仙信仰”的考察就是如此。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思想信仰,神仙观念发端甚早,以往之史书对此已有触及,现代学界也有许多讨论意见,但大多侧重于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线索描述;《新典》则从人类超越有限的“渴望”的心灵层面入手,从根柢上展开深入的追溯。作者指出,出于超越有限的本能生命冲动,原始人类将希望寄托在异己力量之上,于是产生了神灵观念萌芽。道教的神仙信仰也是人类不甘于自己能力的局限和生命的有限这种心理冲动的扭曲反映。接着,作者结合先秦理性认识成果的追溯、原始宗教观念的影响两个角度,阐述了道教神仙信仰的原因,然后勾勒其发展线索,这就使研究对象的特质得到比较鲜明的揭示。

其次,《新典》的新特色,表现在作者善于发现新材料或者发掘旧材料的价值。关于此,这里可以《辨兆》编为例来加以说明。所谓“兆”原指事前出现的迹象,后来引而申之,将预测吉凶的龟甲裂纹也称作“兆”。力图通过某种自然迹象来推论人事,这是古代相当流行的一种术数活动。道教形成之后,也继承了这种术数活动方式。正如其他术数活动方式一样,道教的辨兆术数活动照样存在神秘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术数也与传统科技有一定的关联。为了梳理其中所包含的传统科技因素,《新典》在追溯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著重考察此类活动与古代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关系。作者稽考了《太上洞玄宝元上经》、《盘天经》、《雨炁气候亲机》等许多道经,发掘其中所包含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的知识以及观察记录成果。再如《堪舆》篇,作者就《淮南子》等书相对照,指出传统上指南针的来由及应用情形,反映了道门中人在这

项活动中的作用。像这些材料都是以往学术界所不太注意或者尚未发现其科学史价值的。由此可见作者颇费了一番考索分析功夫。

再次,《新典》的新特色,也表现在许多见解的新颖与独到。例如关于早期道派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阐述,作者在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基础上,侧重从学理上考察该道派与《周易》“图书之学”及《道德经》的关系,作者就五斗米道“五”的来历问题展开追索,认为这个“五”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不仅与老子《道德经》的“主阴”有关,而且具备了《易》之“河洛学”中“五”的学理。五斗米道作为一种以天上星辰为象征的道派,它在观念上遵循的是《道德经》“主阴”的思想,因为天上星辰在物象归属上入于阴类;而在易学法象上它又体现了“大衍”虚天地数之五而不用的“崇五”理念。这就把传统老学、易学与早期道教一脉贯通起来。至于太平道所信奉的“中黄太一”问题,作者则从该等信仰与易学“尚黄”思想以及西汉即已存在的“太一占盘”之关系入手加以解读,剖析其立足的思想根据。这样的追索无疑是比较深刻的,而且也是颇具创获性的。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相当注意将道教的思想理念与传统文化的其他分支联系起来考察,从而使其来龙去脉清晰地显露出来。

当然,这部著作也有不足之处。例如,该书目录以十二地支作为篇章顺序,将“申”误为“辛”。从《占卜》篇等正文中对十二地支的正确使用情形看,目录编排上的问题应该是校对错误,这令人遗憾。不过,从总的情况来看,《新典》乃是目前为止对道教文化详尽论述的学术著作。它的篇章结构体例、论述风格和资料的翔实等特点,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相信此书的出版能够对世界道教研究有一番新的推动,对于传统文化爱好者也将有其独到之裨益。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邮编:  
361005 责任编辑:宁 静)